



投资依然是提振经济发展的主力

2012年,中国经济下滑到7.8%的增速;今年中国的经济如何,各方面都在讨论。我国现在还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中后期,投资还是起重要作用。“十二五”时期,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很多投资规划都要实行,所以今年经济投资仍然会起主要作用。

■ 张汉亚 中国投资协会会长

从国家角度讲,去年年底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,提出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,就是说中央对投资还是非常重视的,要保持经济平稳发展,投资是主要的。

今年我们分析,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是会达到一个比较大的比例。今年投资发展有一个促进因素,就是保证投资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,既有促进因素,也有一些制约因素。促进因素主要是新一届政府,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在今年换届。新政府上来以后,对经济发展会非常重视。现在GDP还是很重要的,所以地方政府积极性还是很高。不管怎么说,我们没法扭转,只能通过改革扭转。这些年依赖投资,过快发展,经济过热,我认为都是地方政府造成的。特别表现在去年,国家提出把稳定经济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之后,地方政府出了多项措施。地方政府对今年的投资增长都是20%以上的计划,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积极性都比较高。

投资不是说今天政策下来,今天就能见效。2008年、2009年也是这样,一般半年以后见效。大一点的项目建设周期,全国平均是三年,往往第二年、第三年投资量比较大,第一年投资量不大。所以,去年以来的一些政策,对今年投资是一个比较大的促进作用。

“十二五”时期,我们有宏伟的建设规划,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,包括全国基本建成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,各种大型水电、核电项目,等等。这些项目如果在“十二五”完成,绝大多数项目都需要在2013年开工,否则“十二五”规划完不成任务。再加上去年新上的项目,对今年也是一个促进作用。

民营投资现在占全部投资60%以上,民营投资这几年虽说融资难、垄断等等,但去年配合36条出台了42项配套政策。这些政策有很多还是不到位,很多能不能执行我们不管,确实存在这些问题,但是有一些执行了之后也能促进民营投资增长。

不利因素主要是资金比较缺乏。近日公布的企业盈利,规模只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点几,国有企业还是亏损。企业如果没有资本金,它上项目的积极性就不高。地方政府钱少,它们是投资主力,但去年地方政府主要是靠土地、房地产。去年土地出让整个比前年少了百分之十九点几,将近1/5。还有价格也降了,所以去年的土地收入比前年降了30%左右。这样,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没钱了,相对来讲他的投资积极性不会太高。

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现在制造业竞争太激烈,很多企业实业投资不挣钱,就不投了,这方面也影响投资增长。

不管怎么说,房地产是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,其本身的GDP贡献大概是4%—5%,上下带动20%。如果它发展起来,对经济带动作用比较大。从去年来看,新开工房和建筑面积都是缩小的。但是从数据本身看增长还是不错,增长了16%。去年的700万套保障房都是由房地产开发投资的,所以真正的商业房地产投资实际上是下降的,造成开工率下降。

总体来讲,房地产现在如果不放松,对经济还是一种压制作用。政府还是主要的,这几年明显反映出来,政府对经济调控的力量非常大。从今年看还是保经济稳增长,投资还会保持增长。去年是20.6%,今年就可能达到24%左右,在这样的投资条件下经济增长会达到8.4%。

(注:本版文章系根据“2013首都经济管理学会新春联谊会”相关专家发言整理,未经本人审阅;题目为编者所加。)

对当前经济生活中几个热点问题的认识

■ 程路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、西部发展促进会理事长

投资其实是一把双刃剑。去年上半年经济一路下滑,中国的经济也是“丢盔卸甲”。我们提出的方针就是稳经济,促发展、调结构、保增长、惠民生、促改革。这样一些方针,调结构根本就是很少有人谈及,因为出口不行,内需也不行,实际去年就全靠增长,全靠投资。投资到最后形成了25个行业,23个全都产能过剩,钢铁竟然生产了9亿吨,至少富余1.5亿吨,水泥3亿吨。

今年是我们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年,也是“十二五”走了将近一半的承上启下年。今年我们关心什么,今年开局怎么做?我担心通货膨胀的问题跟投资是连在一块儿的。为什么呢?可能有的同志讲,现在通货膨胀没有这个压力,去年在前年5.4%的基础上,降至2.6%,最低的时候到了1.7%,很不错;GDP是7.8%,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软着陆。因为经济还算是次高速的发展,物价又相对温和,2.6%是很温和了。为什么我们今年要担心通货膨胀呢?因为如果今年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,中国的经济就什么也不是。出现了通货膨胀实际不是通货膨胀,是滞胀,因为经济发展不上去,物价又那么高,那就是滞胀,治理滞胀比治理通货膨胀难得多。

为什么要治理通货膨胀?去年12月份中央经济会议给出的政策,其中货币财政政策是比较宽松的。但是,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来,要适当地扩大2013年融资贷款的规模,扩大对社会货币的投放量,这都给地方政府产生了很大的想象。今年有很多经济学家已在具体地预测了:第一季度就会降准,降两次,每次50个基点。这说明我们的货币政策是比较宽松的,全世界也都是这



样。现在都在印钞票,欧洲银行在印,英国在印——英国现在要脱欧独立,美国的联储在印,日本的央行不用说了。这次的达沃斯会议,日本的货币政策,货币贬值允许物价稳定地有计划地坚定不移地温和上升的政策,实际上在达沃斯会议受到了一种批判。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相当之宽松,已经泛滥了。去年9月份第三次货币宽松,不到三个月12月份又一次货币宽松;连在一起,大概是足释放出万亿美金的流动性,而且你还不知道他时间的上线。这以前,除了使美元贬值、黄金上升之外,它还要向新兴国家流,向中国流。去年年底的时候,我国香港已经感到这个压力了,所以香港经

局已经向银行系统注入了很多港币,这也会影响到中国内地。再加上大宗货币的涨价,以及国内劳动力供给的刚性的提高,都会控制物价的上升。

我们的货币印得也太多了。去年我们的GDP增速7.8%,完成了52万亿。但是我们货币印了100万亿,这个比例差不多是1:2,而美国只有1比零点几。美国为什么货币这么宽松,美国的物价特别稳定,总是在二三,从来没有像我们一下跳到五或者跳到六。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,关起门来自己玩儿,一旦出事,那你能受得了吗?所以一定要防止今年开局之货币宽松,物价上涨。现在我们物价一涨,统计局就说那

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分之间的关系



■ 邓荣霖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、中国人民大学工学系原主任

第一,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中国现在对经济的基本常识没有共识,各讲各的。我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成分有三个,关系要处理好。一是消费者。我在1988年写了一本书叫《市场学基础》。什么

是市场,消费者构成了市场的核心,消费者满意的生活资料、生产资料,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第一位的,第二个成分是企业,我给它一个定位叫基本成分。第三个成分是政府。

现在我们的问题在哪里?计划经济体制把这三个成分关系颠倒了。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是第一位的,企业围着政府转,消费者围着企业转。而市场经济体制要把计划经济体制三个成分关系还原过来,还原到生产力发展方向上来,但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共识。

市场要具体化,市场最重要的是指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,市场不能抽象化。现在的问题是,这三大成分是三大利益集团,最重要的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没有保证,消费者的利益没有保证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,官员也是消费者,他也受到惩罚。企业是满足消费者的需要,政府要为企业服务,但是我们现在政府的权力太大。中国的改革主要矛盾是改政府,政府的职能要明晰,政府的机构要精简,政府的权力要关在笼子里。反正它得压缩,政府不能自己改,那样会改不动,因为它是个利益集团,必须由

别人来改,这一点必须搞清楚,当然学者可以提建议。

我觉得好多改革这几年是倒退的。比如说企业没有行政级别,很早就明确了,可现在企业的级别越来越重要,民营企业也搞个级别,这叫莫名其妙,这是倒退的。级别是什么,是政府的利益把它权力化了。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成分关系今天是颠倒了,我们要还原过来。但阻力很大,主要来自两个方面:一是思维障碍,要解放思想;二是权力冲突、利益冲突。

第二,企业是主体,民营企业还要发展,自己要争气。企业怎么发展,还是两类企业,国有企业要改革,民营企业要建制。国企要改制,都是制度创新,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。包括三类,一是产权制度,二是组织制度,三是管理制度。产权是前提,组织是保证,管理是基础。我们现在产权还是根本问题,组织就是人事,公司治理,董事会、股东,形成一套制度,我们现在还是按照计划经济那套级别在走。公司治理在中国远远没有到位,包括我们上市公司,存在一大堆问题。企业制度创新本身要解决三个制度的创新。

是天冷,蔬菜上涨,都是“猪”惹的祸……实际并非这样,主要的问题还是货币宽松,钞票印得太多。所以大家有这样一种心态,特别是地方政府,现在都摩拳擦掌,准备大上项目,大干一场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有这个精神。如果这样干,非常有可能引起通胀。

今年我们再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楼市的调控。楼市的调控去年非常不美妙,我们连续调控了五年,最严厉的也调控两年了,但是去年50个大中城市都在涨。

今年关心的还有一个事就是反腐败的问题,反腐败现在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。反腐败今年怎么反,突破口在哪儿,也是很重要的。随着现在房叔、房婶等不断地落马,从另外一个角度倒逼我们必须对官员进行限制,对他们的财产进行限制,对财产要进行公布。但是财产公布非常困难。现在讨论财产能不能公布,有人说财产不能公布。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、知名的官员公提出来,要对承认错误的腐败官员赦免,对十八大以后不再腐败的官员进行赦免,通过冻结他们的腐败存量,换来我们一个清明政策的增量。如果要制裁的话,可能鱼死网破,甚至鱼不死网就破了。

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,我们党有没有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和利益阶层,如果没有形成的话,为什么要怕?这些腐败分子都是一些个别的,为什么要怕这些人会颠覆你的政权呢?深圳现在搞试点,这个问题还是要先走。十八大的报告里就写了,国情、国情、党情都发生了变化。党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,我们这些学者们,搞党史研究的,党建研究的,能不能定性、定量给一点分析?究竟有哪些变化?有没有形成特殊的利益阶层?如果没有,我们来处理这些腐败现象怕什么呢?

第三,要解决三类企业的关系。这三类企业是按照企业形态划分,一是小企业,二是大公司,三是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,这三类企业,现在关系没有处理好。我认为,民营企业要发展,靠自己,不能靠计划经济那一套,那是不行的。企业不按级别走,要靠市场竞争力去发展。

第四,企业成长的方式要解决。三类方式,一是新建,自己解决投资;二是扩建,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;三是并购、兼并,包括国内并购,国际并购。我们现在并购也没有搞好,在国际上绝大部分并购实际上是损失的。

第五,企业成长的基因。我们现在企业成长还是靠政府,最近广州市有一个企业跟广州市提要求,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持。广州市委书记讲得好,我扶持你,国有企业是政府亲生儿子,那民营企业就不是吗,外资就不是吗?所以还要靠自己成长。

现在提倡企业内部的凝聚力、财务的稳健性,包括金融,我觉得美国不管怎么说,虽有金融危机,但它的企业还是稳定发展的。它的物价为什么稳定,是因为企业效益好。

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区别

■ 刘福垣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

我个人认为,城市化和城镇化不是翻译问题,一字之差,谬之千里。城市化是空间结构的现代化,是与整个国民经济以及工业化、市场化融为一体进行的,我们现在把它们拆开了。上两个项目就是工业化,把城里折腾折腾叫城市化,搞点商场叫市场化,往外一走就国际化,楼盖得高点是现代化。实际上它是一个过程,就是现代化,没有“四化”、“五化”,就“一个化”,就是瓦解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,建立共同劳动为基础的大私有制的过程,这就是现代化。

进一步说,工业化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,不是上两个项目;城市化是空间结构的现代化,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产品、经济要素等向一定的空间集中,用空间来代替时间,节约交易成本,增加分工力度,是一个“去二进三”的过程,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过程。市场化是交换关系的现代化,不是说搞两个产权市场,搞两个有形市场,核心是人们之间的关系达到真正身份平等,都成为市场主体,实现等价交换,同工同酬,按要素分配。这三个化统一的对象是小生产方式和农村的落后社会结构,三个化一个目标、一个对象。所以,得一化带三化,三化同时化。

这些年,我们不太懂现代化为何物,现代化只抓了一个“现”字,人均GDP多少,利润多少,回避那个“代”字,不知道把什么化成什么,所以把这个解开了,又搞了两次分散工业化。所以,现在我们这么大的GDP,第三产业就业才35%左右,为什么?

两次分散工业化,造成服务行业的服务半径不够。服务业一定要有它的服务半径,有了服务半径以后第三产业会创造无数的就业岗位。而我们片面的、分散的工业化,最后造成现在三农问题比较严重。比如,农村成了空头村,老少儿童的留守地,农业成了副业,等等。这说明三农政策就地消化农民的效果并不显著,核心问题在哪儿?在于我们的空间结构现代化落后,连续三个五年规划强调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,到现在战略性没得到很好地实施。战略性就是要解决主要矛盾,而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,是我们的空间结构落后,是我们2.6亿的农民工进了城,转变了分工,并没有转变身份,创造GDP都超过50%了,结果身份还是二等公民,在城里不能消费。如果城市化搞起来了,让农民工真能市民化,在城里消费,使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状态改变,我们就能扔掉外贸的拐杖,他国就得改变态度。所以,战略性调整就是抓市民化,千万不要再搞城镇化,“镇”是一个地域概念,是搞新区,搞小城镇变成了国际重镇,那就出问题。

现在的发展战略一定要明确,现代化就是要化掉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经济,现代化就是把封建主义化成资本主义的过程,就是消灭小农经济,搞现代化的大农业,而不是装备农业,你给多少钱没有用。如果城乡没有差别,能有务工潮吗?因此,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生产方式,最可靠的的就是空间结构的现代化,把工业向县以上集中。这样一个社会结构的大变化,需要给国民经济一个准确的定位,如果眼睛就盯着GDP,把GDP的增长当红利,发展观如何能转变了呢?



我们现在经过30多年的高歌猛进的发展,改变了2.6亿农民工的分工角色,可以说是半发展了,如果把人家身份转变了,那就是全发展了。发展是人,不是GDP增多多少。所以,我们一定要真正转变发展观。

现在中国大多数以户籍为单位的农民,他们59%以上的收入都是非农收入,真正靠那点地不到41%了。我们现在市民化就是要做这件事,最后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中割断他的土地的宅基地的封建垄断,他才能真正成为城市居民。当务之急是90后的农民工,90后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命运。90后的农民工他们没种过地,而且对共产党也没有那么深厚的

感情。90后农民工进城以后受到了什么待遇——拿着不到一半的工资,像候鸟一样流动,而且这样的流动也因为阶层的原因受到了阻碍。所以,当务之急要尽量先把90后农民工的身份转变了,让他们过上城市生活,提高他们的劳动力素质,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,使他们能融入社会,这样我们的国家才安定。

所以我认为,当前应先抓市民化,而且市民化要优先解决90后,对他们不要走保险的路子,而是要一步到位走保障的路。保障到了位,他就能安定地正常生活了。保障就是纳入当年中央财政预算,这点钱要没有,就把办公楼卖了也得解决,少盖一栋楼,少修一条路,也得解决社会保障。